

## 政治·法学研究：诉讼法学专题研究

# 我国庭审实质化改革障碍探析

林国强

**摘要：**目前，技术层面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存在如下局限和不足：适用案件范围选择不当、裁判案件无法摆脱案卷依赖、合议过程与结果虚化、裁判庭外产出机制普遍存在、庭审实质化追求形式效果。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面临着法官观念和心理、体制方面的深层次障碍。要突破这些障碍，应从以下方面努力：高层应深入推进体制改革；法官应转变观念，落实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具体要求；立法机关应适时修改与庭审实质化改革不相符的法律；鼓励制度创新。唯有对这些深层次障碍方面进行实质性突破，此项改革的成效才能全面、彻底显现。

**关键词：**庭审实质化改革；改革障碍；技术性改革

**作者简介：**林国强，法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庭审实质化问题研究”（2017BFX012）。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9.04.004

自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来，如何推进此项改革，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实现庭审实质化是推进此项改革的重要抓手和核心内容。基于此，决策层<sup>①</sup>、学术界、实务部门均做出了努力，极力推动庭审实质化的落地生根。在实务界，四川省成都市法院系统推进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初步构建起了“以繁简分流、轻案快办为前提，以庭前准备为基础，以证据‘排非’、人证出庭、综合认证为重点，以专业化审判、静默化管控、信息化服务为支撑的庭审操作模式和工作体系”<sup>[1]</sup>，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最为直接的体现是采用实质化庭审后，不少案件出现了“意外”——意外的证据变化、意外的裁判结果，即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裁判结果出现<sup>[2]</sup>。应该说，成都法院系统在政治体制和诉讼体制不变、制度资源有限、法院地位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现有的改革成效并且得到各方的充分肯定，实属不易<sup>[3]</sup>。然而，不论是高层决策，还是实务部门推进此项改革，整体上均采用了一种“技术性改革”的路线，并未增加实质有效的制度性约束规范，更没有触及影响我国刑事庭审改革基本方向的理念、体制问题<sup>[4]</sup>，导致技术性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必然并且已然遭遇“瓶

① 决策层出台的相关文件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四五”改革纲要、“两高三部”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及《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以下简称为“三项规程”）。

颈”。因此,要全面深入推进庭审实质化,除了继续推动现有技术层面改革措施的落实外,还须探寻影响此项改革推进的深层次障碍。只有突破深层次障碍,才能推动庭审实质化向纵深发展。

## 一、庭审实质化技术性改革的局限和不足

目前技术层面的庭审实质化改革的主要抓手是充实、完善庭前会议、“排非”程序以及法庭调查程序。其中法庭调查程序以提高证人出庭率为核心。尽管此项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试点未能深入触及与庭审实质化不符的理念、体制,因而其带来的庭审实质化效果必然是浅层的、有限的。

### (一) 适用案件范围选择不当

目前推行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试点法院,在适用范围的选择上,排除了部分案件,如职务犯罪案件。理论上,越是重大、复杂、疑难或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越需要庭审实质化。职务犯罪案件大都属于这种情况,因而是最需要实质化的案件类型。试点法院将职务犯罪案件排除在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案件范围之外,正是推进此项改革中障碍的集中体现。另外,试点法院还存在将控辩双方争议较小的案件纳入实施庭审实质化案件范围的情况。这一做法显然犯了前提性的选择错误<sup>①</sup>。选择性地推进庭审实质化,使得此项改革的试点价值大打折扣,无法为此项改革的铺开提供全面、精细化的可借鉴样本。

### (二) 裁判案件无法摆脱案卷依赖

在庭审实质化试点案件的审理中,从形式上看,法庭调查辩论阶段进行得非常充分,特别是辩方的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达到“畅所欲言”的效果。然而,庭审形式上的充实并未带来“事实查明在法庭”。合议庭裁判案件的结果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案卷。成都市法院系统为阻断侦审联结,最大限度降低案卷对法官的影响,在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在制订改革方案时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程序法官阅卷制:合议庭组成后,主审法官在庭前指定一名法官担任本案的程序法官,由程序法官在庭前阅卷,并组织开庭前会议,整理庭审焦点;而合议庭其他成员包括主审法官在庭前都不阅卷,亦不参加庭前会议,仅仅听取程序法官的报告、查看程序法官整理的关于本案争点的书面材料,如《控辩争议事实、证据表》《出庭作证人员名单》等。通过此项改革,一方面合议庭能够把握庭审重点,掌控庭审进程,提高庭审效率;另一方面,能够有效保证合议庭多数成员不受案卷影响,保持以“白纸”心态参与审判,并促使合议庭将主要精力放在庭审上,通过庭审来查明事实,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sup>[5]</sup>。然而,此项改革和传统的承办人制并无区别。在传统的承办人制度下,也是由承办人一人阅卷,合议庭其他组成人员不会阅卷。因为在实行承办人制的情况下,合议庭成员均为承办人,都有自己承办的案件,根本无力、也不愿意花费时间去阅其他承办人的卷。而且,这一改革也无法保证合议庭其他成员特别是承办人在通过庭审无法得出确定结论时,经由程序法官了解案卷内容以及事后看卷。从试点法院庭审实质化运行情况看,对定罪量刑起关键作用的证据依然是被告人庭前供述与书面证人证

<sup>①</sup> 有实证研究显示,在试点法院,采用庭审实质化审判的案件中,有四成案件被告人完全认罪或争议较小。这些案件本无开展实质化审判的必要。参见左卫民:《地方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26页。

言，庭审实质化改革并未明显改变固有的审判模式<sup>[6]</sup>。

### （三）合议过程与结果虚化

在实施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案件审理中，从形式上看，应该说较好地体现了实质化的要求，举证、质证、辩论过程表现得较为充分，但庭审结束后的合议过程却仍然存在虚化的情况。而合议实质化亦是庭审实质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合议虚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能充分合议。司法实践中，合议一般由承办法官介绍案件事实，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其他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由于其他成员未阅卷，庭审中也未必集中精神听审，他们对案件的了解仅仅是通过承办人的口头汇报，因而，合议通常不能进行深入充分的讨论，最终一般以承办人的意见为合议庭意见。二是合议庭合议后，某些特殊案件须经过庭务会进一步讨论<sup>①</sup>，必要时还应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如果属于提交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流程上，必须经过庭务会和主管副院长把关。而庭务会和审委会经过讨论后能够改变合议庭的意见。由此，合议制度被侵蚀。

### （四）裁判结论的庭外产出机制仍然普遍存在

一些疑难重大复杂案件，即使庭审过程形式上实现了实质化，但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庭外机制形成裁判结论，不符合“裁判结论形成在法庭”的要求。一般认为，判断裁判是否形成在法庭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是否当庭宣判。因为庭审实质化更强调和青睐当庭宣判，当庭宣判能够形成倒逼机制，要求法官必须更加积极、认真地参与庭审，重视庭审质量<sup>[5]</sup>。针对试点法院当庭宣判情况的实证调研显示，当庭宣判的案件有80起，占样本案件总数的38.1%<sup>[3]</sup>；针对同一试点法院的另一实证调查显示，在采用庭审实质化审判的案件中，有四成案件被告人完全认罪或争议较小<sup>[6]</sup>。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当庭宣判达到了一定比例，但当庭宣判的案件大都是被告人认罪或争议不大的案件，而那些较为复杂、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仍需要通过庭外机制做出裁判。司法实践中，裁判庭外产出机制主要有：庭务会、主管院长、审委会讨论决定，上级法院（法官）答复<sup>②</sup>，政法委（三机关）协调会商，等等。这些复杂、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最需要庭审实质化，也是实现庭审实质化的重要载体，亦是判断庭审是否实现实质化的“试金石”。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案件裁判庭外产出机制，导致此类案件的庭审实质化并不完整。

### （五）追求庭审实质化的形式效果

在此项改革试点过程中，庭审实质化的推进出现了庭审实质化“形式主义”的现象。如在试点法院审理的一起“盗转抢”案件中，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行窃后在被抓捕过程中实施了持刀反抗行为，依据是掉落在地上的一把打开的折叠刀，该折叠刀不像弹簧刀，不可能在掉落的过程中自动打开，因此，该刀应当是被告人取出来并打开的。但被告人否认有持刀反抗行为。至于刀为什么是打开的，被告人也说不清楚。因此，本案认定“盗转抢”的关键在于，被告人在被抓捕

① 如有些法院规定，发回重审以及改判的案件，应当经过庭务会讨论。在法院改革过程中，许多法院设立了审判长联席会议、法官专业会议等组织，以解决审判业务中的复杂、疑难问题。但这一机制大都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有些甚至形同虚设。其原因在于不易操作。目前法院还是以业务庭为基本单位的建制，而审判长联席会议或法官专业会议是跨业务庭的组织，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好组织协调。

② 上级法院的答复通常通过请示汇报或内审机制产生。所谓请示汇报是指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处理或程序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予以答复的制度。所谓内审是指下级法院审理的某些特殊案件，在下判前应上级法院的要求，报上级法院内部审理并由上级法院做出如何裁判的答复的制度。

过程中是否取出并打开折叠刀进行反抗。在庭审中,证人保安甲、协警乙、后来赶来的警察丙以及鉴定人(说明那把折叠刀不可能自动打开)出庭作证。其中,甲称看到被告人取刀并打开;协警乙和警察丙均称自己看到被告人摸刀,丙甚至走到被告人面前,仔细地辨认了一下,确定被告人就是被抓捕的人。然而,乙、丙庭审证言与庭前书面证言有较大出入:乙的书面证言是他听见甲喊被告人有刀;丙的书面证言是他到现场后被告人已被甲、乙制服,刀已经掉在地上并打开。本案法庭未采纳庭审证言,改变了指控罪名,当庭判决被告人犯盗窃罪<sup>[3]</sup>。

证人出庭作证是庭审实质化的重要表征,通过对出庭证人的质证确定证言是否可采,进而充实庭审活动。在我国,由于有庭前证言的存在,因此,证人出庭意义还在于,通过对出庭证人的质证,确定采纳庭前证言还是庭审证言。在该案中,出现了证人出庭改变庭前证言,合议庭最终未采纳庭审证言的情况。这一判决似有问题,庭审中证人改变庭前证言有些蹊跷。通常情况下,证人当庭改变庭前证言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而在本案中,证人在庭审中却做出了更加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改变。在证人均均为控方证人的情况下,此种证言的改变显然不是证人能够擅自决定的,应是控方要求的。控方在应当知道其要求证人当庭改变证言导致庭前证言和庭审证言矛盾,存在庭审证言可能不被采纳,进而指控不被支持的风险的情况下,仍然这样做,对其动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配合法官的审判,以此表明庭审已实质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效果。此时的庭审实质化只能是形式意义上的,偏离了改革的初衷,也无法实现改革的目的。因此,改革形式化的倾向尤其值得警惕。

## 二、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深层次障碍

应该说,技术层面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继续深入推进此项改革却面临着深层次障碍。上文阐述的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局限和不足是深层次障碍作用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要求,到2016年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然而,随后出台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此并未做出实质性突破,如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及“三项规程”,尽管其中有一些新的表述,但没有实质性变革。由此导致目前的改革只能在技术层面展开。未来要实现彻底的庭审实质化,应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制约和妨碍庭审实质化的深层次障碍。

### (一) 法官在观念与心理方面不适应庭审实质化的障碍

观念与心理都是务虚的东西,却也是最为顽固的存在。当下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深层次障碍之一是长期以来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形成的不适应庭审实质化的观念和心里。这些观念(心理)直接妨碍了此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深化此项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是法官(即办案人员)的观念(心理)。办案人员如果无法形成与庭审实质化相匹配的观念(心理),即使有完善的制度,也无法有效落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法律人很容易陷入制度中心主义的陷阱,认为制度到位了,问题就解决了。然而,无论有多好的制度,缺乏合适的人去执行它,也只是一套空文”<sup>[7]</sup>。

#### 1. 追求实质公正与倾向于打击的思维惯性

毋庸讳言,目前我国法官群体中,追求实质公正与偏重打击的思维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庭审实质化所要求的程序正义、权利保障有时会发生冲突。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法官倾向于选择前



者，比如支持证人不出庭的主要原因是追求实质公正。笔者在某法院挂职期间，曾和多名法官交流此问题。在参与的案件中，也提出要求关键证人出庭，但合议庭其他法官均表示，最好不要让证人出庭，原因之一即无法保证庭审证言真实可靠，证人庭审所言不一定为真。特别是辩方申请对已有利的证人出庭。这些法官认为，这意味着辩护人已经做好了证人的工作，庭审中证人必然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此时证言的真实可靠性将大打折扣。笔者反驳指出，如果证人出庭，通过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质证，可以发现证人证言是否真实可靠。但法官们表示，庭审此项功能发挥得并不好，证人出庭作证反而可能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对法官而言，其对言词证据的判断是以真实可靠性为导向，而非形式上的是否出庭。故而，庭前证言并非均虚假，庭审证言并非都真实，证人并非必须出庭。有学者认为，应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即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其书面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以此倒逼证人出庭。这一建议与法官追求实质正义、有效打击犯罪的指导思想及裁判理念不符，恐难实施。同时，在重打击观念的影响下，当庭前证言和庭审证言发生冲突时，法官更易相信侦查机关获取的庭前证言。由此，作为庭审实质化重要标志的证人出庭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解决。

再如庭审中对辩方权利的保障。在某种意义上，庭审实质化就是对辩方权利保障的实质化。在重打击、追求实质公正观念的支配下，法官对辩方权利的保障存在限制程序权利和保障形式化两方面的问题。对辩方程序权利的限制表现为限制辩方发问、质证、辩论等权利，导致庭审中辩方“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出现了辩护的“新三难”<sup>①</sup>。对辩方权利保障的形式化体现在，庭审中辩方行使了程序权利，但流于形式，不会对法官裁判案件形成实质影响，即“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此种观念还体现在承办法官对控方案卷的查漏补缺。在司法实践中，承办法官阅卷后，发现卷宗中存在问题，会主动和公诉人沟通；在庭审中发现问题，会私下建议补充侦查。承办法官绝不会在发现问题时，仅凭检察机关移送的证据，在不与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沟通协调的情况下，径直做出判决。法官和控方配合在庭外对卷宗查漏补缺，极大地冲击了庭审活动的实质化。

## 2. 过度依赖案卷的心理

在长期的办案实践中，法官形成了案卷依赖心理。1996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为《刑事诉讼法》）未解决这一问题，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恢复的全案移送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在新老法官的“传帮带”培养机制下得以传承，并得到制度的认可。对刑事诉讼流程而言，程序之间的转换是以卷宗的流转为载体和体现的；对法官而言，裁判案件的心证是建立在案卷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这种心理顽固地生长在每一位办案法官心里，对他们而言，不看卷是无法办案的；不吃透卷宗内容是无法准确办案的；只有对卷宗全面把握，才能有效地驾驭庭审<sup>②</sup>。

法官阅卷时间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庭前阅卷。因为有了庭前对案卷全面、细致的

<sup>①</sup> “新三难”是相对于“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旧三难”而言的。

<sup>②</sup> 老法官通常讲“开庭的效果取决于法官对卷宗把握和熟悉的程度”。笔者在某法院挂职期间，作为合议庭组成人员，尝试了不看卷参与庭审。笔者发现，对一些简单案件，庭前不看卷，通过庭审能够把握案件主要信息，能够支撑最终的案件处理；但对复杂案件，尽管依靠庭审也能获得主要信息，却无信心仅依据庭审信息做出裁判。因此，如果是承办人面对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为谨慎。

阅读、分析<sup>①</sup>，庭审对法官而言就变得无足轻重。另一种是庭后阅卷。有时，因各种原因，法官来不及庭前阅卷，先安排开庭，庭后再阅卷，形成判决。由此，“刑事案件往往庭审时间很短，审后阅卷、制作法律文书的时间较长”<sup>[8]</sup>。不论哪个阶段阅卷，法官总是希望尽快完成庭审，由此实际形成以阅卷为中心、庭审走形式的审判模式。法官对卷宗的过度依赖，必然导致不重视庭审，庭审仅仅是印证其阅卷后心证的过程。

### 3. 庭审实质化增加工作负担和案件处理难度的心理

庭审实质化对法官把控庭审的能力要求相当高。这不但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还会给案件的顺利处理带来麻烦。这一心理因素看似微小，却涉及法官的切身利益，故而影响也最为直接。

仍以证人出庭为例。在我国，证人出庭问题理论论证上简单，但在司法实践中操作却较为麻烦。首先，证人大都为控方证人，控方一般没有要求证人出庭的积极性，通常由辩方申请。此时需要法官和检察官协调，如果检察官以某种理由搪塞，法官一般无能为力。其次，如果检察机关不反对证人出庭，那么，需要承办法官给证人做思想动员工作；因为，在我国，证人从内心上排斥出庭作证。再次，尽管法院可以强制证人出庭，但强制证人出庭，需要协调法警，执行时需要承办法官亲自前往，给法官工作带来较多不便和麻烦。同时，一旦证人出庭后改变庭前证言，不仅对公诉人成功指控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对法官处理案件也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此时，法官面临着采纳庭前证言还是庭审证言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庭前证言对控方有利，庭审改变的证言对辩方有利。证人当庭改变证言，往往会将法官置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把案件导入复杂的困境。因此，法官对证人出庭态度较为消极。

庭审实质化改革中出现的形式化倾向也和此种心理有关。一方面改革要求庭审必须实质化，甚至可能存在具体指标的硬性要求；但另一方面庭审实质化给法官带来的是工作量和案件处理难度的增加。在这两方面的夹击下，对法官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庭审实质化的形式化。具体表现为非法证据排除调查、法庭实体问题调查、法庭辩论的形式化。

另外，还有一个不被重视但也是庭审实质化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二审不开庭审理，亦和此种心理有关。理论上，庭审实质化也应包括二审庭审实质化，而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庭审实质化的前提，二审开庭率不容乐观。《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确立了“二审以不开庭审理为原则，开庭审理为例外”的规定，导致大多数二审案件不开庭审理。实证研究表明，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二审开庭案件数量整体上有所提升，但仍较低。局部实证数据显示，2013—2014年某高院二审开庭率分别为25.77%和25.74%，某中院二审开庭率分别为7.81%和7.37%<sup>[9]</sup>。未开庭的案件审理，庭审实质化无从谈起。从《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看，除了四种必须开庭的情形外，其他情况是否开庭交由法院决定。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选择不开庭，其背后的原因与法官及检察官的开庭意愿有关。整体来看，二审开庭增加了法官、检察官的工作量，导致其积极性不高<sup>②</sup>。即使法院拟开庭审理，也非法院能够直接决定，还需要征求

① 这种全面、细致的阅卷不仅仅是承办法官单方面的行为，还包括与公诉人的沟通、对案卷的查漏补缺等双向交流活动。

② 司法实践中，二审法院为了规避开庭增加的负担，对那些辩方就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这些事实和证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案件，通常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无须开庭直接发回重审，即使通过二审能够查清事实，亦是如此。

检察官的意见。如果检察官不愿意开庭，则无法开庭或者需要通过强势协调才能开庭。

#### 4. 分散司法责任的心理需求

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司法责任制被视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司法责任对法官而言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促使法官客观公正、认真细致地办案，另一方面也是悬在法官头顶的利剑。法官作为理性人，必然会产生趋利避害的心理。当法官办案遇到风险时，其主观上愿意借助责任分散机制，如庭务会、审委会、请示汇报、内审、协调会商等，来保证裁判的安全性<sup>①</sup>。

在上述观念与心理支配下，庭审对法官查明案件事实而言并非最有效的途径，庭审未实质化或通过庭外方式未必不能查明案件事实甚至更便于查明案件事实。庭审实质化不仅不利于有效打击犯罪，而且可能给法官带来一定麻烦和风险。因此，法官们对庭审并不重视，对实现庭审实质化的举措落实也不积极，即使案件开庭审理，证人出庭作证，辩方举证质证辩论权得到了保障，但最终呈现的也可能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庭审实质化，整个庭审沦为“你做你的证，我判我的案”“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的新闻接审理主义<sup>[10]</sup>。

#### （二）体制障碍

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必然触碰到体制的壁垒。在技术层面改革逐步落实的情况下，体制性障碍对此项改革的困扰不断凸显。如果能够打破体制障碍，则此项改革可以获得更广阔的纵深空间。

##### 1. 法院在体制内权威不足、独立性不强

要实现庭审实质化，法院审判必须有足够的权威性和一定的独立性。“无权威、不独立，则无中心。”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审判中心主义与其说是程序法问题，不如说其主要还是司法权力结构配置的问题。如果这种深嵌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并时刻影响中国刑事诉讼运作的司法体制迟迟无法改变，其对‘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阻碍力度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其改革本身的失败也是大概率的事件。”<sup>[11]</sup>

当下，我国法院权威不足、独立性不强，这一表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在我国的政法体制中，法院在政法综合权重中所占比重偏弱<sup>②</sup>，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法院不但无法有效地制约侦查和检察机关，反而受制于前者。我国刑事诉讼活动在此种体制的长期影响下，形

① “裁判的安全性”是笔者在某法院挂职期间，一些老法官经常提到的概念。所谓“裁判的安全性”，大致是指法官做出的裁判应确保在法律、社会和政治层面是安全的。换言之，法官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做出裁判后不会出现被改判、发回以及引发责任追究、信访、舆情事件等风险。这些责任分散机制亦是上文提到的裁判案外产出机制。设立这些机制的初衷是保证案件处理的质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机制不仅成为法官保证裁判安全的“避风港”，而且也是架空庭审实质化的重要“推手”。尽管高层对这些机制的适用做了限制，如最高法院强调案件请示只能就法律的适用问题进行请示，不得就事实、证据认定或者裁判结果向上请示；在请示的形式上要求书面请示，不得口头、电话请示。但在司法实践中，下级法院往往突破了这些限制。可以说，只要存在此类制度，其弊端就如影随形。

② 童之伟认为，政法综合权重用公式表示为：“具体国家机关或领导岗位的政法综合权重＝其所分享的执政党权威性资源＋其现有的法定职权。执政党权威性资源主要指其从乡镇党代会、党委到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代表、委员、常委资格。政法综合权重是目前我国执政党的职能与国家职能高度合一状况下必须纳入研究范围的一个指标。没有这个指标，我们的研究活动会严重脱离实际，结论也不会可靠。”参见童之伟：《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何以强化》，《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6页。

成了“侦查中心主义”的基本构造。这一诉讼构造对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及庭审实质化形成了较严重的负面效应。有学者指出,侦查中心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方式内含着政治、舆论等强大压力,使得法院不得不接受侦查机关的侦查结论<sup>[12]</sup>。这一分析切中要害。另一方面,法院无法有效抵御外部的压力,有时甚至必须主动的审理服从外部的要求。在特定时期或者特定案件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由此,在某些案件审理中,裁判并非法院“一家之言”,而是需要借助外部机制做出。故而,庭审实质化的体制障碍并不在于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定位,而在于三机关在体制中不均衡的权重和地位。

## 2. 监察体制改革对庭审实质化的不利冲击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以及《监察法》的出台赋予了监察机关强大的职务犯罪调查权,加之监察委员会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职务犯罪案件在我国特殊性,导致在此类案件中,庭审实质化的落实可能更为困难。换言之,拥有强大调查权以及超过法院政治权威的监察委员会的设立,进一步强化了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使得法院在审判职务犯罪案件时独立性和权威性更为弱化,由此导致法院不愿在此类案件中推行庭审实质化。正因为如此,试点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将职务犯罪排除在外。

监察体制改革导致职务犯罪查处职能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进一步强化。监察体制改革之初,学界对此改革可能带来的附带效果持乐观态度,认为:失去侦查权的检察机关更有可能按照诉讼规律从事公诉活动,既能维护法院的中立裁判者地位,也更可能实现与辩护方的平等对抗,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走出侦查中心主义构造将有着积极的意义<sup>[13]</sup>。然而,监察体制改革却导致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仍然保留了检察机关的部分自侦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根据该立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而后出台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列举了14种自侦案件,其中包括了《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涉及法官审判行为的罪名。因此,检察机关原来所拥有的针对审判的强力监督权——侦查权并未完全消除,学者所设想的“职务犯罪调查权归属于监察委后,检察机关不会再以追究刑事责任作为行使所谓‘审判监督权’的手段,法院的审判活动将具有更为宽松的环境,法院实现公正审判也具有更大现实可能性”<sup>[13]</sup>的局面难以实现。总之,在公检法之间原来的格局和政法权重并未实质改变的情况下,又增加了监察委员会这一因素,致使庭审实质化改革面临的体制障碍更为坚固。

上述这些深层次障碍直接影响了立法,使得立法设置的某些制度与庭审实质化改革不相适应,如案卷移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辩护制度、庭审调查制度等<sup>①</sup>,同时,也滋生了一些架空庭审实质化要求的潜在运行机制,如请示汇报、内审、协调会商等裁判文书外产出机制。在办案人员的前述观念(心理)支配下,这些制度在执行中进一步背离了庭审实

① 因学界从庭审实质化或审判中心改革的角度对这些制度的研究较多,本文不再赘述。



质化改革的方向。

### 三、突破庭审实质化改革深层次障碍的思考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庭审实质化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改革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修补和完善，更需要解决制约此项改革推进的深层次矛盾。在深入推进此项改革的进程中，需要从理念、体制、制度和技术层面全方位发力。各地试点法院从技术层面落实庭审实质化改革并为全国其他法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随后改革将进入攻坚阶段。此时，理念、体制方面的障碍愈加凸显。要突破这些障碍，第一，需要顶层设计，深入推动体制改革，为庭审实质化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我国，庭审实质化“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需要法律智识同时需要政治智识，这是凝聚共识、争取支持、攻坚克难最为重要的工作抓手”<sup>[3]</sup>。因此，庭审实质化改革应当在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确立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将确保裁判权力的独立性、实质性作为未来改革的重要方向<sup>[11]</sup>。这样的现实背景决定了此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更加需要高层秉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升人民法院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权重和地位。路径之一是由人民法院院长兼任政法委书记，成为同级省委常委。同时，高层应持续不断地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保持改革的力度和热度。在我国，诸如此种重大改革必须由高层强力持续推动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否则，将导致改革在没有取得实质成效的情况下被其他改革热点淹没和冲淡，甚至半途而废。这是笔者最为担心的。因此，高层务必保持推进此项改革的定力和决心，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第二，由于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成效最终需要通过具体法官在个案中予以呈现，因而，法官对庭审实质化改革重大意义的深刻认识以及其有足够的意愿和动力落实此项改革的具体要求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每一名法官切实树立现代审判理念，从内心深处认同此项改革，并积极主动地在个案处理中推动此项改革，进而形成燎原之势，为庭审实质化的全面落实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能够防止改革“上热下冷”的问题。第三，立法机关应适时修改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废除与司法规律以及庭审实质化不相符的制度，修改阻碍庭审实质化改革推进的制度因子，弥补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制度空白。第四，高层应给各级法院留下一定的制度改革创新的空间，对那些有利于庭审实质化的探索性做法及时给予肯定，条件成熟时予以复制、推广。

#### 参考文献：

- [1] S省C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C市法院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工作调研报告 [M]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3集.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96.
- [2] 马静华. 庭审实质化：一种证据调查方式的逻辑转变——以成都地区改革试点为样本的经验总结 [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5）：67-80.
- [3] 张斌，罗维鹏. 庭审实质化的技术路径反思与政治路径证成 [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23（3）：36-53.
- [4] 孙长永，王彪. 论刑事庭审实质化的理念、制度和技术 [J]. 现代法学，2017，39（2）：123-145.
- [5] 万毅，赵亮.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C市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为样本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6）：112-119.
- [6] 左卫民. 地方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实证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2018（6）：110-133，206-207.
- [7] 郑戈. 美国财政宪法的诞生 [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18（3）：22-38.

- [8] 龙宗智. 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 [J]. 法学研究, 2015, 37 (5): 139-156.
- [9] 李婷. 司法改革背景下刑事二审庭审实质化问题思考——以刑事二审审判权的运行实践为出发点 [J]. 法律适用, 2016 (7): 101-106.
- [10] 陈瑞华. 新间接审理主义——“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主要障碍 [J]. 中外法学, 2016, 28 (4): 845-864.
- [11] 左卫民. 审判如何成为中心: 误区与正道 [J]. 法学, 2016 (6): 4-10.
- [12] 陈瑞华. 论侦查中心主义 [J]. 政法论坛, 2017, 35 (2): 3-19.
- [13] 陈瑞华.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理论反思 [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8 (1): 34-43.

## On Obstacles of the Substantive Reform of Court Trials

Lin Guoqia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exist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substantive reform of court trials at the technical level: inappropriate selection of applicable scope of cases, case judging can't get rid of the dependence on case files, emptification of collegial process and results, universal outside-court output mechanism by judges, the pursuit of formal effects of substantive court trials. The further advance of the substantive reform of court trials also faces deep-level obstacles in terms of concept, psychology and system. To break through these obstacle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enior leaders should deepen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judges should change their minds and implement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substantive reform of court trials; the legislature should timely revise law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substantive reform of court trials;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Only by making substantial breakthroughs in these deep-level obstacl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form can be fully and thoroughly demonstrated.

**Keywords:** substantive reform of court trials; obstacles of reform; reform at the technical level

(收稿日期: 2019-05-09; 责任编辑: 晏小敏)